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

《左傳》研究：敘事與紀事本末

計畫編號：NSC 88-2411-H-002-032-

執行期限：87年8月1日至88年7月31日

計畫主持人：張素卿

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系

一、中文摘要

中國敘事以史傳為大宗，《左傳》乃典範之作。傳統術語所謂「敘事」，基本的形式特徵為「原始要終」，始、終屬於時間範疇，此種文體的發展實與編年體淵源深遠。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同屬編年，前者文字簡要，為編年記事；後者依經敘述其本末，發展為編年敘事。學者因應研經讀傳的需求，於是有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應運而生。此種文獻，以「事」為經，重新組構《左傳》本文，其情節編構表現出研讀的心得，寓有對事理本末的見解。

關鍵詞：

1. 春秋左傳學
2. 史傳
3. 敘事
4. 紀事本末
5. 情節編構

Abstract

Key Words

1. *Chun-chiu Tzo-chuan studies*
2. *historical writing*
3. *narrative*
4. *narrative chronicle*
5. *emplotment*

二、緣由與目的

敘事是人類普遍的文化現象，敘事研究也已然成為當代學術的顯著課題，無論在文學、歷史學，或哲學、人類學、精神分析 等等領域，都愈益受到關注，並發展為「敘事學(narratology)」——一個具有跨學科意義的學術領域。就歐美文、史學界的敘事研究而言，歷史學者如懷特(Hayden White)，將此議題納入「後設歷史(metahistory)」的研究中，正視歷史的敘事性¹；依史東(Lawrence Stone)考察，七十年代中期以來，更出現一股「敘事的復興」的現象²，愈來愈多的歷史學者不再只專注於內容事蹟，對於再現事蹟的形式及其對內容的具體形塑也十分重視。至於文學界，則向以神話、小說等虛構的敘事為主，著重敘述手法和文本分析等，不僅探討作品的意義，同時也尋索意義如何建構、如何表達。

上述趨勢促成了「中國敘事學」研究的展開。浦安迪(Andrew H. Plaks) 在 1977

¹ 參考懷特之著作: *Metahistory: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-Century Europe* (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74); *The Content of the Form: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* (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87); *Tropics of Discourse* (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90).

² Lawrence Stone, "The Revival of Narrative: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," *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* (New York: RKP, 1987): 74-96.

年就曾編輯過一部以「中國敘事」為題的論文集³，近年直接以《中國敘事學》為書名的中文專著，有浦安迪和楊義兩家。無論是上述兩家的《中國敘事學》，或者其它關於「中國敘事」的研究論著，往往側重小說或虛構敘事，不免猶侷限於西方敘事學的視野。

其實，史傳敘事才是中國傳統敘事的大宗，就此而言，章學誠曾說：「文章以敘事為最難，文章至敘事而能事始盡，而敘事之文，莫備於左、史⁴。」《左傳》《史記》不僅是先秦兩漢敘事發展的兩大里程碑，依章氏之見，這兩部史傳允為敘事的典範之作。在中國的學術傳統裡，敘事的發展頗不同於歐美從神話到史詩、浪漫史再發展為小說的進路，先秦兩漢之時已經出現如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等重要的史傳敘事，它們對後出的志怪、傳奇、話本、章回小說等，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。《左傳》的著作時代比《史記》早，其敘事無論形式結構或者內容技巧，都已臻成熟，於中國早期敘事中尤具代表性。《文心雕龍》有〈史傳〉篇，極力推崇《左傳》，推許為史傳敘事之冠冕⁵。王靖宇的《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》，和孫綠怡的《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》等，就是當代關於《左傳》敘事及其對古典小說之影響的研究專著。可惜上述學者的中國敘事研究，或者直接援據歐美敘事理論用之於中國文學研究；或者，雖然有意「返回中國敘事本身」⁶，卻仍舊侷限在歐美以小說為主流的敘事觀念裡而不自知。當前的學術環境，跨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，參照既有的敘事理論或敘事學研究自然有其必要。然而，就中國敘事研究而言，深入傳統學術領域

尋繹中國敘事的特點，注意史傳敘事的發展源流，實屬必要的基礎工作。

本人的中國敘事研究首先致力這樣的基礎工作，期能以學者視為典範的《左傳》為中心，展開相關的論述。延續先前對《左傳》敘事的研究，這一年執行的專題研究計畫為「《左傳》研究：敘事與紀事本末」，是針對一批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，考察它們如何以「事」為經重新組構《左傳》本文，探析其情節編構，以及其中寄寓的對於事理本末的見解。

三、結果與討論

中國學術傳統之所謂「敘事」，首出「原始要終」的形式特徵，跟編年體的發展源流有密切關聯。《春秋》編年記事，《左傳》依經述其本末，發展為編年敘事。由於編年敘事仍然以時間為主要綱領，歷代學者因應研讀《左傳》的需求，乃又發展出以「事」為主要綱領的「紀事本末」體。就史傳的發展源流而言，《左傳》居於上承記事並下啟敘事之開展的關鍵地位。

(一)「敘事」的涵義及其解釋性

「敘事」一詞乃是中國學術傳統固有的術語，而學者研究中國敘事卻往往逕視為英文「narrative」的對譯詞，鮮少深究其固有的涵義。本人曾根據《文心雕龍·史傳》以及杜預、孔穎達等人的說法，尋繹傳統所謂「敘事」之義，指陳這種文體乃是以「原始要終」為形式特徵，依此形式將人物活動編構為脈絡聯貫的事件整體，這樣，前事、後事不僅具有時間序列的先後關係，同時具備一種事理本末的因果關聯；不僅再現人物活動的起始、變化和終局，並且闡示一個完整行事的原因、發展和結果⁷。敘事在時間序列中呈現一系列事件的始終脈絡，乃是基於事理本末的理解從而對事件進行情節編構所呈現的整體。

敘事「原始要終」，而「始」、「終」基

³ Andrew H. Plaks, ed. *Chinese Narrative: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* (Princeton: Princeton UP, 1977).

⁴ 《章學誠遺書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606。

⁵ 劉勰撰、范文瀾注，《文心雕龍注》（上海：開明書店，1936年），卷4頁1下。

⁶ 楊義語，見氏著《中國敘事學》，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10-16。楊氏雖然有「返回中國敘事本身」的省思和企圖，但以全書討論的內容看來，他關注的領域仍是小說。

⁷ 詳參拙著《敘事與解釋——左傳經解研究》（台北：書林出版公司，1998年），頁94-100。

本上屬於時間的範疇，它的發展於是跟「編年」體淵源深遠。「編年」體依時間序列編纂事蹟，《春秋》和《左傳》分別代表其早期形式和後續的發展：前者還只是編年以記事，後者始詳述事蹟本末，發展為敘事。汪榮祖說明二者的差異，曰：「春秋記事（what happened），語焉未詳；而左傳述之，始明事由（why it happened）。」⁸ 記「事」，只是簡要地載錄發生什麼；敘事，則不僅說了發生什麼事，還說明它為什麼發生。

《左傳》敘事，說明《春秋》所記事件的原委，闡述其「事由」，這就是解釋。敘事的一系列事件之中，起始事件不僅是先發生的，而且意味是導致後續事件所以發生的由來，其間的事件表示發展的過程，終結事件則是發展到最後的結果。敘事之所以具有解釋的功能，正是由於它不僅呈現事件與事件的時間關係，同時也表達了其間的因果關聯。

《左傳》之編年敘事，首出時間序列的形式特徵，「原始要終」以解經，是基於時間性的理解與解釋，顯露出敘事原初的解釋性⁹。《左傳》之為中國敘事的典範，除了文字富艷生動外，對於敘事的時間性與解釋性的揭示意義，尤其值得關注。

（二）從編年記事、編年敘事到紀事本末的發展源流

研究中國敘事不能忽略史傳及其發展源流。就此而言，《左傳》敘事具有關鍵性的地位。

古史有「記言」、「記事」之分，可分別以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為代表。此後，歷經二千多年的發展，傳統史傳的編纂體裁滋益增多，要言之，可大別為編年、紀傳和紀事本末三體。明人劉曰梧在〈宋史紀事本末序〉中扼要指陳三體的差異，他說：

夫古今之有史，皆紀事也。而經緯不同，左、馬之義例精矣，一以年為經，

一以人為經。而建安袁先生復別開戶牖，迺又以事為經而始末具載。¹⁰

區別而言，史傳的編纂體裁或「以年為經」，或「以人為經」，或「以事為經」：「以年為經」者為編年體，依年、時、月、日的時間順序為編纂綱領；「以人為經」者為紀傳體，以人物為中心，以此作為編纂綱領；相對於上述二體，紀事本末體的特點是「以事為經」。雖然三種編纂體裁釐然有別，其記述對象其實都是廣義的「事」，所謂「古今之有史，皆紀事也」。由此而言，凡記述「事」而具備「原始要終」的形式特徵的文體，皆為敘事。誠如杜維運所言：「中國史學中之編年、紀傳、紀事本末諸體，皆為適合於敘事之史學體例。」¹¹ 編年、紀傳、紀事本末三者是就歷史的編纂體裁區分的，就文體而言，這些體裁所纂輯的一篇篇史傳屬於敘事。

如上所言，紀事本末的特點是「以事為經」，其文體其實就是敘事。論及此一體裁的產生，學者們往往根據朱熹、章學誠等人的舊說，或以為源於《尚書》，或以為源於《國語》，這樣的說法忽略了《尚書》於古史屬於「記言」，而《國語》也是以載述問答言語為主¹²，它們跟紀事本末以「事」為綱領的特點迥然有別。本人認為，紀事本末體之所以產生的學術源流當追溯到《春秋》記事、《左傳》敘事的傳統，它跟編年體由記事衍為敘事的發展脈絡，淵源深遠¹³。

《春秋》記事，屬於大事記，簡約扼要，語焉而未詳；《左傳》敘事，始依經詳述，解釋其事理本末。學者閱讀《左傳》，

¹⁰ 見《宋史紀事本末》（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10 冊；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3-1986 年），卷首，頁 4。

¹¹ 杜維運，《清代史學與史家》（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4 年），頁 15。

¹² 《國語》的「語」體特徵，說詳拙著〈《國語》的「語」：內容與形式——從評析「祭公諫穆王征犬戎」出發〉，將發表於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》創刊號（刊印中）。

¹³ 詳參拙著〈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述略——左傳學的考察〉，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85 年 1 期，頁 145-149。

⁸ 汪榮祖，《史傳通說——中西史學之比較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8 年），頁 47。

⁹ 同註 7，頁 242。

由敘事以尋繹其義，需要一番離析貫串的工夫才能本末詳悉，作為推究褒貶經義的基礎¹⁴，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此一文獻類型，就是因應這樣的閱讀需求產生的。關於這點，下節將透過對此類文獻的實際考察，再作申述。

(三) 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考徵

相對於編年、紀傳，紀事本末體的出現比較晚，歷來的相關討論也相當有限。針對《左傳》本文重新編構的紀事本末體文獻，除了《左傳事緯》和《左傳紀事本末》，向來鮮有專門的論述，其書流傳不廣，甚至已經亡佚。

這一年的研究計畫，本人廣泛參考正史經籍志以及《玉海 藝文》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、《經義考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等等書目，詳細考察勾稽。利用史志書目之著錄，經過仔細梳理，各種書目之中，仍以《經義考》的著錄資料搜求最富，並載有相關序錄，可供考徵。茲以《經義考》的著錄為主，同時參考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等書目略作整理，依朝代、姓名、書名和卷數，將這類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簡要列目如下：

- 〔唐〕第五泰《左傳事類》二十卷
- 〔唐〕高重《春秋纂要》四十卷
- 〔唐〕唐文宗《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》三十卷
- 〔宋〕葉清臣《春秋纂類》十卷
- 〔宋〕宋敏修《春秋列國類纂》
- 〔宋〕黃穎《春秋左氏事類》
- 〔宋〕周武仲《春秋左傳編類》三十卷
- 〔宋〕桂績《類左傳》十六卷
- 〔宋〕呂祖謙《左傳類編》
- 〔宋〕陳持《左氏國類》二十卷
- 〔宋〕程公說《左氏始終》三十卷
- 〔宋〕章沖《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》五卷
- 〔宋〕徐得之《春秋左氏國紀》二十卷
- 〔宋〕孫調《左氏春秋事類》二十卷
- 〔宋〕劉伯証《左氏本末》
- 〔宋〕胡維寧《左氏類編》

- 〔宋〕楊泰之《春秋列國事目》十五卷
- 〔宋〕劉淵《左傳紀事本末》
- 〔元〕徐安道《左傳事類》
- 〔元〕曹元博《左氏本末》
- 〔元〕魏德剛《春秋左氏傳類編》
- 〔明〕唐順之《左氏始末》十二卷
- 〔明〕傅遜《春秋左傳屬事》二十卷
- 〔明〕曹宗儒《春秋序事本末》三十卷
- 〔明〕陳可言《春秋經傳類事》三十六卷
- 〔明〕孫范《春秋左傳分國紀事》二十卷
- 〔清〕馬驩《左傳事緯》十二卷
- 〔清〕高士奇《左傳紀事本末》五十三卷

以上，共計二十八種，大多已經亡佚，只能根據相關的序錄略窺其體例梗概。如果書目序錄的說明闕略不詳，甚或只存書名，如唐第五泰《左傳事類》宋劉伯証《左氏本末》等等，只得根據書題之命名取義蠡測。這些文獻重新編纂《左傳》，或稱「事類」、「類編」，或稱「本末」、「事類始末」，或稱「列國類纂」、「分國紀事」等等，大抵跟《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》或《左傳紀事本末》類似，同屬於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¹⁵。

¹⁵ 關於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，四庫全書本《左傳紀事本末》(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69冊；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-1986年)的書前「提要」曾列舉宋以來者十數家，曰：「自宋以來，學者以左傳敘事隔涉年月，不得其統，往往為之詮次類編。其見於史志者，有楊均、葉清臣、宋敏修、黃穎、周武仲、勾龍傳、桂績、呂祖謙、陳持、章沖、徐得之、孫調、楊泰之、毛友、徐安道、孫范等諸家。今其書多亡佚不傳，中如呂祖謙之左傳類編，雖尚散見永樂大典中，而簡略失次且多脫闕，未為善本；惟章沖左氏事類始末全書尚存。」(頁5)此篇「提要」列舉十六家，對照《經義考》之著錄，楊均撰《魯史分門屬類賦類》三卷，毛友撰《左傳類對賦》六卷，這兩部文獻非屬紀事本末體。又，比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中的《左傳紀事本末》「提要」，書前「提要」的上引一段文字，已遭刪除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以袁樞《通鑑紀事本末》為「紀事本末」的創例之書，然而，在袁樞之前，北宋已經有不少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出現，雖然忽略唐代的幾部同類文獻，猶嫌失考，畢竟分纂提要者已

¹⁴ 同註7，頁175-176。

上列文獻之中，目前仍有傳本者據知有五種。一、宋章沖的《春秋左傳事類始末》，通志堂經解和四庫全書均有收錄（四庫全書歸入史部紀事本末類）。二、明唐順之的《左氏始末》，有北京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等藏明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，以及台北國家圖書館（原中央圖書館）、上海圖書館等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劍江徐鑒刊本。三、明傅遜的《春秋左傳屬事》，四庫全書收錄在經部春秋類。四、清馬驥的《左傳事緯》，四庫全書收錄在經部春秋類；一九九二年濟南齊魯書社有點校本出版。五、清高士奇的《左傳紀事本末》，四庫全書收錄在史部紀事本末類；一九七九年北京中華書局有點校本出版。這五部文獻，除唐氏的《左氏始末》外，其它四種都有影本流傳，《左傳事緯》和《左傳紀事本末》並有點校本出版，流傳最廣。¹⁶

依上述文獻及相關序錄的描述考察，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的產生正是因應「原始要終」的閱讀需求。《左傳》依經敘述其事之本末，單篇敘事依時間先後編次成書，相關的事件常隔涉年月，傳文不相接連，讀者為求理解融貫，常需一番離析貫串的工夫。《春秋左傳事類始末》的編撰者章沖曾經自述說：

〔《左傳》〕每載一事，或先經以發其端；或後經以終其旨；有越二三君、數十年而後備，近亦或十數年；有一人而數事所關；有一事而先後若異，君臣之名字，有數語之間而稱謂不同。間見錯出，常病其不屬。學者掇其英精，會其離析，各備其事之本末，則所當盡心焉者。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，

經注意到此一現象，可惜紀昀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總纂官竟然對此大加刪裁，掩沒事實！（對此，本人曾有過討論，同註 13，頁 141-142）此外，依《玉海 藝文》、《經義考》等著錄，宋句龍有《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》，凡是這類並非專依《左傳》的紀事本末文獻，暫不列入討論。

¹⁶ 馬驥、高士奇之後的同類著作，大抵未超出二氏的規模。近人韓席籌有《左傳分國集注》，同屬於這類改編《左傳》的紀事本末體，亦可參考。

而為之事類者，未之見也。沖因先生〔案：指葉夢得〕，日閱以熟，乃得原始要終，摭摭推遷，各從其類。有當省文，頗多裁損；亦裂句摘字，聯累而成文者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小大之事，靡不采取，約而不煩，一覽盡見。¹⁷

章沖閱讀《左傳》，「原始要終，摭摭推遷，各從其類」，於是離析其本文，重新編構，將數年甚或十數年、數十年的事蹟本末，各從其類，俾能一覽盡見。由閱讀而理解之，進而尋索之，尋索有得又進而編構纂輯，最後呈現為《春秋左傳事類始末》這樣的文獻。元楊維禎為魏德剛的《春秋左氏傳類編》寫序時也曾經指出：

三傳有功於聖經者，首推左氏，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，後經以終義。聖人之經，斷也；左氏之傳，案也。欲觀經之所斷，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，而後是非褒貶白也。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，不無繙閱之厭，於是類編者欲出焉。¹⁸

考求事之本末以尋繹經義，由於《左傳》仍屬編年，不免一事先後相關而年月阻隔，讀者每每有「繙閱之厭」。因應《左傳》閱讀者的普遍需求，紀事本末這種依事類編構的文獻於是應運而出。誠如馬驥所言：

舊文傳麗於經，年時月日以相繫維也。易編年為敘事，將令讀者一覽即解，且無遺忘之病。¹⁹

《左傳》敘事原本就以依經詳述本末見長，紀事本末作為一種新出的體例，「易編年為敘事」，係就敘事本文進一步加以聯貫。上文業已指出，相對於編年、紀傳，紀事本末為第三種史體，這是就一部文獻的編纂體裁說的，若就文體而言，紀事本末的文體即是敘事。將《左傳》之編年敘事改編為紀事本末，可說是敘事「原始要

¹⁷ 章沖，《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·自序》（影康熙 19 年刻通志堂經解本；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69 年），卷首頁 2 上-下。

¹⁸ 楊維禎，《東維子文集》（四部叢刊初編影鳴野山房舊鈔本；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 年），卷 6，頁 44。

¹⁹ 馬驥，《左傳事緯·例略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2 年），卷首。

終」的進一步貫徹。

唐、宋以降，這類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紛然迭出，莫不是力求於一篇之中事理本末開卷瞭然，省卻閱讀《左傳》時反覆翻檢之勞，使一覽可解，這是編纂者的初始動機。章沖如此，魏德剛、唐順之、傅遜、馬驢、高士奇等等編纂者亦莫不如此。從楊維楨的說法看來，這樣類聚始末以重編傳文的文獻，頗能順應閱讀《左傳》者的普遍需求「於是類編者欲出焉」，這其實就是閱讀敘事時，「原始要終」以尋索事件之整體脈絡的閱讀需求。

(四) 事件整體的情節編構

每一部紀事本末體文獻，都歷經編撰者由理解而尋索、進而編構的過程。紀事本末「以事為經」，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將事屬同類的《左傳》傳文重新組合編排，顯示出以「事」為中心，探求其始終本末的閱讀取向。

如此閱讀，如此理解，終究是為了「原始要終」，深入明瞭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後果。這樣說來，將原本在《左傳》中分屬不同年月下的傳文編構起來，實際上反映了編纂者對事件因果的連繫，是對事件整體的情節編構。這是各家編纂者閱讀《左傳》的心得呈現。諸書編纂的原則和條目頗或參差，正反映他們各自對事件的整理和掌握，寄寓其事理本末的見解。

《左傳》敘事已經有將跨越多年的事件集中載述的傾向。僖十五年敘韓原之戰，開篇自「晉侯之入也」至「故秦伯伐晉」一段，將前傳已經記載過的事蹟又扼要綜述，表明這些正是導致「秦伯伐晉」的因素。這樣的寫法，尹達認為「帶著濃厚的『事具本末』的紀事本末體的意味」²⁰。此外，僖廿四年《左傳》敘述晉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然後復國的事蹟本末，說明他周遊於列國，遭遇何種磨難，終於在賢才輔佐之下回到晉國取得君位。陳其泰認為：「《左傳》這種編撰方法，實際上是在

²⁰ 尹達，《中國史學發展史》（台北：天山出版社，出版年月不詳），頁 39。

編年體中有機地糅合了紀事本末的因素。這一創造對後人是一個很大的啟發。」²¹

《左傳》有「事具本末」的意味，這是敘事本身具備的特徵，對於後來紀事本末體的出現誠然有啟發作用，卻還不能說它就是紀事本末，畢竟紀事本末主要是指一部書的編纂體裁。史體與文體的區分，不可不辨。

由於依經編年，《左傳》中不相接連的傳文之間，有時在行事或文理脈絡上，張本繼末而脈絡潛通，這其實是揭示《春秋》經文彼此之間的關聯²²。本人在〈左傳戰爭敘事論析〉一文中，曾經舉述隱九年、十年經傳為例加以說明：這兩年中的幾段傳文，其修辭用語明顯地相互呼應，提供了最佳的線索，依線索貫串，一系列的傳文宜看作是一篇敘事，其中一段「君子曰」正是綜觀整體地加以評論²³。基於這樣的閱讀，將傳文編構成情節貫串的篇章，庶幾乎就是紀事本末體文獻形成的大致過程。準此而觀，《左傳》的行文修辭本身的確能引導讀者，對紀事本末體的產生很有啟發作用。

春秋時代是霸主爭盟的時代，齊桓公卒，宋襄公繼之崛起，有意取代其霸主的地位。對此，《左傳》中有一系列敘述文字，散見迭出，而意常貫串，各家紀事本末文獻，大概就是依準傳文線索編構情節，所以纂錄篇章大同小異。以下就舉此為例，稍作比較說明。

章沖《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》以「宋襄爭盟」為題，始自僖十六年「春，隕石於宋五，隕星也。六鷁退飛過宋都，風也。」終於僖廿三年「宋襄公卒，傷于泓故也。」以此為本末，編錄成篇²⁴。僖廿二年，宋、楚泓之戰，襄公戰敗負傷，

²¹ 陳其泰，《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》（北京：書目獻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 56-57。

²² 同註 7，頁 184-195。

²³ 詳參拙著〈左傳戰爭敘事論析〉（「周易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會議論文，台北：中國經學研究會等主辦，1999年5月8-9日），頁 7-8。

²⁴ 同註 17，卷 1 頁 37 上-38 上。

不僅不能一酬與楚爭諸侯、為盟主的壯志，隔年便傷勢發作而卒，終了這一場未及展開的霸業。章氏以隕石、六鷁退飛一段情節起始，這是著眼於宋襄公「是何祥也，吉凶焉在」之一問，對此，周內史叔興順著襄公的心意回答說：「君將得諸侯而不終。」如此看來，宋襄公問災祥，即已透露出合諸侯以主盟的心意，所以章氏以此為「宋襄爭盟」的起始事件。唐順之《左氏始末》纂輯宋襄公事則推始自僖八年「宋公疾，大子茲父固請曰：『目夷長且仁，君其立之。』公命子魚，子魚辭。」²⁵後來，傅遜《左傳屬事》、馬驥《左傳事緯》和高士奇《左傳紀事本末》等三家，也都將子魚讓國此一情節納入。傅遜並在「宋襄公卒，傷于泓故也」之後，加列僖廿四年「秋，宋及楚平。宋成公如楚，還，入于鄭，鄭伯享宋公有加，禮也」，以此為「宋襄公圖霸」的終節²⁶；馬、高二氏亦然²⁷。如此編排的緣故，無非是表現宋襄爭盟圖霸的競爭對象首在楚國，而宋、楚兩國又都採取伐鄭或救鄭以引出對方的策略，終以宋、楚平，鄭伯享宋成公，正所以結束這一系列的爭霸事件。仔細玩味尋繹，唐、傅、馬、高四家以子魚之事為起始事件，如此的情節編構比章沖更能揭示《左傳》貫串於字裡行間的微意。為什麼呢？在宋襄圖霸的一系列事件當中，舉凡襄公用鄫子於社、圍曹、鹿上之盟、孟之會楚執宋公既而釋之、伐宋，以及泓之戰襄公「不鼓不成列」等事，子魚曾經一再勸諫進言，可惜未獲採納，馬驥評論說：「初，公之立也，以子魚為左師，自是以來，每舉必諫，倘用其一言，猶堪救禍。襄公知其仁而不能聽其謀，剛愎自用，莫

此為甚。」²⁸《左傳》藉著子魚的言論表現對襄公的褒貶，霸業不成的原因也就昭然可見。子魚由勸其修德，到直指其禍，甚而針對襄公「不鼓不成列」等師心自用的說詞一一反駁，隨著宋禍加劇，子魚發言也愈益激切；子魚的言論前後呼應，並藉以呈現情節之推展。然則，整個事件推始於「宋公疾，大子茲父固請曰：『目夷長且仁，君其立之。』公命子魚，子魚辭」，的確能彰顯《左傳》貫串前後的微意。

尋繹傳文線索以編構情節，紀事本末的纂輯者閱讀《左傳》而各有領會，隨著見解不同，篇章選裁也就或同或異。如上所述，這是反映編纂者閱讀的心得，寓有他們對事件整體脈絡和事理本末的理解與解釋。不論是論述春秋時代的歷史，還是就《左傳》研究、中國史傳敘事之研究而言，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誠然是值得關注的一批文獻。

四、計畫成果自評

「紀事本末」體出現得晚，向來較少專門的論述，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尤其冷門，除了《左傳事緯》和《左傳紀事本末》，唐、宋以來一批同類型的文獻相繼出現，又先後失傳。經本研究計畫之考察、論述，有以下所述的幾項具體的研究成果可以貢獻於學界。

首先，「紀事本末」體是三大歷史編纂體裁之一，學者因襲四庫館臣之見，往往以為袁樞的《通鑑紀事本末》是此種體例的開山之作，此一見解值得商榷。經由考察得知：唐代已經出現《左傳事類》、《春秋纂要》、《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》一類的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，北宋如葉清臣、宋敏修、黃穎、周武仲等又相繼而作，這些文獻比南宋袁樞緣於《資治通鑑》而作《通鑑紀事本末》的撰作時間早了很多。毫無疑問的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以袁氏書作為「紀事本末」體的創例之書，實屬偏失。

其次，本研究計畫運用，廣泛考察各種史志書目，整理自唐至清的「《左傳》紀

²⁵ 唐順之，《左氏始末》（明萬曆四十二年劍江徐氏刊本，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書），卷6頁1上-3下。

²⁶ 傅遜，《左傳屬事》（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69冊；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-1986年），卷2，頁531-533。

²⁷ 同註19，頁84-87。又，高士奇，《左傳紀事本末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），頁537-541。

²⁸ 同註19，頁88。

事本末」體文獻計廿八種。並且根據少數流傳的文獻及相關序錄，基於文獻目錄之學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的觀念，仔細梳理，認為其發展源流係由古之編年記事演變為編年敘事，而後才又演變為紀事本末。這一史傳的發展源流跟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的學術傳統，淵源深遠。研究中國敘事，不能忽略史傳，梳理此一學術源流，對中國史傳敘事的發展提供一個大綱，一個初步的輪廓。當然，如何進一步調整或補充，仍有待後續研究。

第三，本研究指出，紀事本末這種編纂體裁的特點是「以事為經」，顯示出以「事」為中心以探求其始終本末的閱讀或理解傾向，恰是因應敘事「原始要終」的特徵。紀事本末的文體其實就是敘事，所以馬驥說《左傳事緯》是「易編年為敘事」。史體、文體，不宜混淆。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的編撰者，為了深入明瞭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後果，將《左傳》中事屬同類而散見迭出的傳文編構起來，這反映出他們對事件因果的連繫，是他們閱讀《左傳》的心得呈現，寄寓其事理本末的見解。從敘事之情節編構的觀念出發，重新審視各家的心得、見解，這對於論述春秋時代的歷史，或是《左傳》、中國史傳敘事之深入研究，都很有意義。²⁹

²⁹ 附案：「《左傳》研究：敘事與紀事本末」這項研究計畫，原擬分兩年依序進行，先整理《左傳》評點家對敘事的分析及其術語，然後結合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，探討傳統學者對《左傳》敘事之情節編構的見解。由於申請通過只是一年期計畫，本年度計畫只得針對專題之主要部分，以「《左傳》紀事本末」體文獻為討論中心。由於《左傳》評點資料之搜集耗費相當時間，目前先完成部分的考察工作，並以〈評點分析——經典的閱讀與解釋〉為題，在臺灣大學主辦的「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」研究計畫第五次研討會上發表（一九九九年七月三—四日）；原先擬訂的先期作業——由評點之本文分析的術語梳理工作，有待後續的研究計畫俾能完成。

五、參考文獻

(一)

章沖，《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》（影康熙 19 年刻通志堂經解本），台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一九六九年。

章沖，《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》（影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349 冊）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—一九八六年。

唐順之編著、徐鑿評，《左氏始末》，明萬曆四十二年劍江徐氏刊本，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書。

傅遜，《左傳屬事》（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69 冊）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—一九八六年。

馬驥，《左傳事緯》（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75 冊）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—一九八六年。

馬驥，《左傳事緯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一九九二年。

高士奇，《左傳紀事本末末》（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369 冊）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—一九八六年。

高士奇，《左傳紀事本末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九年。

韓席籌，《左傳分國集注》，台北：華世出版社，一九七五年臺一版。（原一九六三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。）

王靖宇，《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。

孫綠怡，《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。

浦安迪，《中國敘事學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。

楊義，《中國敘事學》（楊義文存第一卷）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。

張素卿，《敘事與解釋——左傳經解研究》，台北：書林出版公司，一九九八年。

Plaks, Andrew H., ed. *Chinese Narrative: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*. Princeton: Princeton UP, 1977.

(二)

張高評，〈左傳敘事法探微〉，《孔孟學報》四十一期(一九八一年)，頁二二三—二三四。

伊根著、張端穗中譯，〈左傳中的敘事文〉，《東海中文學報》三期(一九八二年)，頁一九—三九。

崔文印，〈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特點及其發展〉，《史學史研究》一九八一年三期，頁九—一三及一八。

王義耀，〈左傳事緯與左傳紀事本末〉，《史學史研究》一九八二年四期，頁四四—四八。

蔡學海，〈紀事本末史研究〉，《淡江學報》第十九期(一九八二年五月)，頁一三一—一四九。

王靖宇，〈怎樣閱讀中國敘事文——從《左傳》文藝欣賞談起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》，鍾彩鈞主編，頁一—十七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一九九二年。

王靖宇，〈美國的左傳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三卷一期(一九九三年)，頁七二—八〇。

張高評，〈左傳學研究之現況與趨向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二輯(一九九四年)，頁六三—七〇。

李紀祥，〈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與紀事本末體〉，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，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廿七—廿九日，頁五一—三—五四五。

陳來，〈馬驢史學試評〉，《齊魯學刊》一九九六年四期，頁五五—六一。

張素卿，〈文心雕龍史傳篇注譯〉，《古今文選》新 842-843 期，台北：國語日報，1994 年 9 月 3、17 日。

張素卿，〈章沖《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》述略——《左傳》學的考察〉，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八十五年第一期(一九九六年六月)，頁一三一—一五〇。

張素卿，〈《左傳》戰爭敘事〉，「周易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會議日期：一九九九年五月八—九日，主辦單位：中國經學研究會、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。

(三)

晁公武《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》(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淳祐袁州刊本)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七六年。

陳振孫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(書目續編影武英殿聚珍本)，台北：廣文書局，一九六八年。

王應麟，《玉海 藝文》(影元後至元三年慶元路儒學刊本)，台北：臺灣華文書局，一九六四年。

《宋史 藝文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〇年。

馬端臨，《文獻通考 經籍考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。

焦竑，《國史經籍志》(書目五編影粵雅堂叢書本)，台北：廣文書局，一九七二年。

朱彝尊《經義考》(四部備要本)，台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一九六六年。

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(影文淵閣原鈔本)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年。

紀昀等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(影武英殿刻本)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年。

張之洞撰、范希曾補正，《書目答問補正》(影蒙文通校點本)，台北：漢京文化公司，一九八四年。

(四)

劉勰撰、范文瀾注，《文心雕龍注》，上海：開明書店，一九三六年。

陳邦瞻，《宋史紀事本末》(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10 冊)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三—一九八六年。

章學誠，《章學誠遺書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。

錢穆，《中國史學名著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一九七三年。

劉節，《中國史學史稿》，河南：中州書畫社，一九八二年。

杜維運，《清代史學與史家》，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一九八四年。

尹達，《中國史學發達史》，台北：天山出版社，出版年月不詳(原河南省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)。

汪榮祖，《史傳通說——中西史學之比較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

陳其泰，《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》，北京：書目獻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。
瞿林東，《史學與史學評論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。

Lawrence Stone, "The Revival of Narrative: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," *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*. New York: Routledge and Kogan Paul Inc, 1987. pp.74-96.

Hayden White, *Metahistory: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-Century Europe*. 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74.

-----, *The Content of the Form: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*. 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87.

-----, *Tropics of Discourse*. 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90.